**9**

•••••••••••••••••••••••••••••••••••••••••••••••••••••••••••••••••••••••••••••••••••••••••••••••••••••

**女性主义（Feminism）与科学研究**

* 1. **“科学是政治的”**

在20世纪后期，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新型的审视。在某种程度上，科学的整体形象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人文学科领域。尽管在此进行概括性论述有风险，但我们可以说，在过去三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科学在西方社会中一直被视为一种进步的、反权威的力量，能够挑战并打破根深蒂固的观念和体制。这种观点在18世纪的“启蒙时期”表现得最为鲜明；对科学作为一种进步力量的信心，正是现在被称为“启蒙价值观”的一个方面。尽管如此，科学的这种文化形象并非没有例外，例如在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中，以及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知识文化的各个部分在20世纪后期见证了对科学态度的更大转变。冷战是导致这一转变的一个关键原因，但也有其他思潮在发挥作用。

科学不再被视为进步力量，反而被视为维持“现状”（status quo）的一种力量，尤其是在政治不平等方面。在自认为是进步而非保守的政治立场中，许多人开始将科学视为一个更宏大、多触角的政治结构的一部分。这个结构的作用是强化（reinforce）微妙形式的排斥（exclusion）和胁迫（coercion），即使在表面上“自由民主”的社会中也是如此。科学的反权威形象被认为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好的公关”（good PR）。这意味着科学所谓的进步性和批判性，可能只是一种对外宣传的形象，而非其本质。此外，有人认为，科学机构本身充满了隐性特征，这些特征包容一些个体，同时又排斥另一些个体。

许多人认为，通过揭示科学机构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联系，就可以清楚地表明“科学是政治性的”，而非一个独立于政治之外、因其政治中立性而享有特殊权威的机构。揭示科学的政治嵌入性（political embedding），对于教育、医学以及其他各种关键的社会政策领域中的问题，都将具有重要的相关性。

这种对科学的“新态度”（即前文所述的，对科学政治性的认识和批判）最主要的体现，在于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feminist critiques of science）和女性主义科学哲学（feminist philosophies of science）的发展。这将是本章第一部分的主题。本章的第二部分将关注另一种理解科学的新方法：即一个被称为“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的跨学科领域（interdisciplinary field）的兴起。

* 1. **理性之人**

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思考构成了一场多元化的运动。它也许通过一个核心思想而得以统一，即科学一直是维系男女不平等结构的一部分。科学本身，以及关于科学和知识的主流理论，都曾帮助将女性置于思想者、认知者和知识公民的“二等”地位。（即使这些关于女性主义科学讨论的概括性论述也有例外。）根据女性主义的分析，社会因此受到了损害，科学本身也未能幸免。因此，某种形式的改革是必需的。关于适当的改革类型存在分歧——从简单地建议在科学领域纳入更多女性，到鼓励科学中出现特定类型的女性“声音”，再到将科学从其在西方文化中的卓越地位上“去王权化”（dethroning），即削弱其绝对权威。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思考常常与科学社会学的工作结盟，并且库恩（Kuhn）、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等思想家也被视为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一些女性主义者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建立了“更不幸的联盟”。

我们应该区分关于科学的女性主义哲学思想与更基本的女性主义政治思想。广义上的女性主义旨在理解并对抗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包括政治权利、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不平等。这在科学领域有一个简单的应用：多年来，女性一直被排斥或不被鼓励从事科学工作，就像她们被排斥在其他高声望工作领域之外一样。这是一个简单的机会平等问题，它引发了关于政策（例如平权法案的适当性）的讨论，但它本身并不涉及科学哲学的问题。

除了前面提到的机会平等问题，其他女性主义研究确实深入探讨了关于科学的哲学问题。这些研究可以归类为三个相互重叠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思想史和科学史中的女性主义分析。第二个层面是对特定科学领域和理论的女性主义分析，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生物学和医学中。第三个层面是女性主义认识论，即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理性、知识以及其他基本的认识论概念。在此，我将包括与认识论相关的科学社会结构分析。

我将从讨论一部该传统中较早的著作——吉纳维芙·劳埃德（Genevieve Lloyd）1984年出版的《理性之人》开始。劳埃德在书中分析了关于知识和理性观念的历史根源，同时也为认识论（epistemology，即知识论，研究知识的本质、来源、范围和局限的哲学分支）得出了结论。对于我们而言，书中特别相关的讨论见于其早期章节，其中她考察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和培根等思想家。这本书展现了一个常见的模式：劳埃德在思想史上讲述了一个非常有趣——有时甚至引人入胜——的故事。但是，要从这些历史事实中推导出它们对认识论有何具体影响（what consequences these historical facts have for epistemology）则更加困难。

劳埃德（Lloyd）认为，关于理性（reason）和知识（knowledge）观念的早期发展，受到关于男性特质（maleness）与女性特质（femaleness）之间关系的观点的极大影响。在西方哲学中，理性的概念演变过程中，合理性（reasonableness）被与男性气质（maleness）联系起来。同时，女性思维（female mind）则被与一系列与合理性形成对比的心理特质相关联。这些对比的特质可能包括情感、直觉、非逻辑等，从而在观念上将女性排除在“理性”的范畴之外。

根据劳埃德的观点，这种思维模式（即理性与男性的关联，女性与非理性的关联）的一个关键来源，是古老的“女性特质与自然”之间的联想。她指出，大地是肥沃的、女性化的、生命的源泉，这种原始联想奠定了后续思维模式的基础。通过这种联想，关于心智（mind）与自然（nature）之间关系的观念，也以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为模型来构建。性别之间的关系也为理论化心智内部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模型——例如感知（perception）与思维（thought）之间，以及理性（reason）与情感（emotion）之间的关系。结果就是，欧洲早期科学和哲学发展中的思想，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都融入了“理性与男性特质”之间的关联。同时，“女性特质”（femininity）概念的发展，则被“女性特质与理性”的对立所塑造。女性特质被与接受性（receptivity）、直觉（intuition）、同理心（empathy）和情感（emotion）等特质联系起来。这进一步强化了理性与男性特质的绑定，并将女性特质推向了与理性相对立的另一极。

劳埃德（Lloyd）最经典的例子是17世纪英国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培根曾大量著述，阐述新的经验调查方法及其对人类的承诺。培根批判了古希腊将知识视为沉思（contemplation）的观念。对他而言，真正的知识体现在对自然的控制（control of nature）上，他的名言是：“知识就是力量。” 然而，当培根发展这一思想时，他却保留了将自然视为女性的形象。他将心智（knower，求知者）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类比为婚姻模式，即求知者（男性）与自然（女性）的结合。在培根的观念中，由男性主导的“好婚姻”的特征，与成功认识世界的特征相对应。那么，一个“好丈夫”是怎样的呢？一个好丈夫是尊重的（respectful），但同时也是坚定的（firm）并且绝对掌控（definitely in charge）的。科学家在接近自然时，应该带着尊重和克制（respect and restraint）。但掌控无疑是必需的；培根认为，“自然只有在艺术（即人类技术和实验方法）的掌控和压力之下，而非在享受其自然自由时，才会更充分地泄露其秘密。”而这种“婚姻结合”（nuptual couch）的产物，将是有助于人类进步的有用知识。（引自劳埃德 1984, 11-12。一些其他女性主义者对培根的批判远比劳埃德严厉：参见哈丁 1986）。

像这样的案例表明，关于男女关系的观点是理性与知识观念发展中的重要资源。尽管这个问题很复杂，但这些关联无疑似乎影响了女性的生活，也影响了早期现代时期科学的发展路径。更困难的问题是，鉴于此后政治生活和科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历史事实对我们现在具有怎样的哲学后果（philosophical consequences）。不难发现这些旧关联的残余（residue）仍然嵌入在现存的隐喻（metaphors）中。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科学家们经常谈论某个现象是否会“屈服（yield）”于某种特定的分析方法。作者个人认为（尽管并非所有人都会如此感知），这种隐喻总是带有性征服的意味（resonance of sexual conquest）。但是，这些隐喻对当今社会或科学是否仍有显著影响，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伊芙琳·福克斯·凯勒是一位认为这里存在真实问题的女性主义者。她认为，我们继承的科学的普遍图景（即科学的传统形象和运作方式）对进入科学领域的女性产生了实际影响；女性科学家必须在“不真实性”（inauthenticity）和“颠覆性”（subversion）之间做出选择。“真实性” （authenticity）这个概念是一个微妙的概念，源自存在主义哲学。但凯勒用一个类比来说明她的观点： “正如女性参与男性的厌女笑话会付出不真实性的代价一样，女性认同以父权制丈夫为模型的科学家形象，同样会付出不真实性的代价。” （2002, 134–35）

* 1. **灵长类动物学的案例**

我现在将转向一个许多人认为是性别在科学特定领域中扮演角色的一个很好的、清晰的例子。更具体地说，这常常被视为一个研究者的性别对思想发展产生影响的案例，也是一个科学因女性在该领域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而受益的案例。这个例子涉及过去大约三十年对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例如黑猩猩和狒狒）的社会行为，特别是性行为的研究。这些现象主要在灵长类动物学（primatology）和行为生态学（behavioral ecology）领域中被研究，尽管这两个领域在侧重点上略有不同。

生物学的这些领域（指灵长类动物学和行为生态学）最初形成了一种灵长类动物性生活的图景，其中雌性被视为相当被动。社会生活，特别是性生活，被认为由雄性控制，有时甚至是残酷地控制。这种图景与演化生物学中一些重要的“高层理论”（即抽象、普遍的理论框架）相关联。在许多（但绝非所有）动物中，雄性个体之间的生殖成功差异巨大，而雌性生殖成功的差异则较小。这是由于一个雄性理论上可以使大量雌性受孕这一事实所导致的。正如常言道，“精子是廉价的”（sperm are cheap，指雄性生殖投入成本低）。

这种两性之间的不对称性（指雄性生殖成功差异大，雌性差异小）在存在这种现象的生物体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演化意义。但是，这种不对称性常常被用于相当简化的解释模式中，而没有考虑到许多其他因素可能修改其影响的方式。在早期灵长类动物学中，这种不对称性被用来支持一种观点：雄性性行为已经通过自然选择被精细打磨（finely honed），而雌性行为则没有，原因是雌性对自身生殖成功的影响小得多。

根据萨拉·布拉弗·赫尔迪（Sarah Blaffer Hrdy）2002年的著作，这种（即前文所述的雌性被动、雄性主导的）观念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转变。仔细的观察揭示了雌性灵长类动物扮演着更为主动且复杂的角色。事实变得很清楚，许多雌性灵长类动物拥有复杂的性生活，涉及的性接触种类比基于旧观念所预期的要多得多。雌性似乎会参与对雄性行为的微妙操纵模式，并且这种操纵的很大一部分可能旨在影响雄性对后代的行为。雄性交配成功的高潜在变异性（即雄性生殖成功差异大）对行为演化有巨大影响这一基本理论观点仍然成立。但是，现在对这一因素与其他因素（特别是雌性可用的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了一个更加复杂和精密的认识。

灵长类动物学领域思维上的这一转变，至少大致上与大量女性涌入该领域相吻合。事实上，灵长类动物学是女性参与度异常高的科学领域之一。女性的出现对改变该领域的观念起到了什么作用？根据赫尔迪（以及我交谈过的其他人）的说法，在灵长类动物学界内部，女性代表性增加在改变人们对雌性灵长类行为的看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观点相当普遍地被接受。赫尔迪补充说，这种观点在美国似乎比在英国更被接受（2002, 187页）。赫尔迪本人对此问题相当谨慎，但她认为，像她这样的女性研究者确实更倾向于同情（empathize with）雌性灵长类动物，并且比她们的男性同事更细致地观察其行为的细节。

* 1. **女性主义认识论**

现在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女性主义认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女性主义认识论中与科学相关的那一部分。这是一个多元化且有时具有挑战性的领域。它包括将女性主义理论作为基础，来批判科学如何处理证据和评估理论的研究。它还包括对科学社会结构和组织的女性主义批判，尤其是在这些结构影响到认识论问题时。最具抱负的是，一些女性主义认识论者提出，甚至我们关于理性、证据和真理的基本概念都隐含有性别歧视。女性主义认识论也超越了单纯的批判，提出了关于改革的建议——如何让科学更好地探索世界（如果这个目标仍被保留的话），以及如何使科学更具社会责任感。

在讨论一些选项时，他将修改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在1986年和1996年提出的分类方式。哈丁区分了三种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其中最早且争议最小的一种，她称之为“自发女性主义经验主义”（spontaneous feminist empiricism）。“自发女性主义经验主义” 是指利用女性主义视角来批判科学工作中的偏见和其他问题。但重要的是，这种批判不挑战科学的传统理想、方法和规范。

哈丁的第二种类别是哲学女性主义经验主义。海伦·朗吉诺（Helen Longino）1990年的著作可能是这个流派中最具影响力的，将在下文进行讨论。这一流派的目标是修订和改进关于科学和知识的传统观念，但其方式仍然忠实于最基本的经验主义主题。这个流派要避免相对主义。它希望能发展出对特定科学实践更精密的批判。

第三个类别他将称之为激进女性主义认识论（radical feminist epistemology）。在这个分类中，可以区分出两种主要方法。其中一种是哈丁称之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feminist postmodernism）。这种研究倾向于拥抱相对主义（embrace relativism）。它认为，不同性别、不同族裔群体和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存在根本性差异。在这种观点下，认为存在一种超越这些不同视角的、单一的“真实”世界描述，是一种有害的幻觉（harmful illusion）。

第二种激进方法是立场认识论（standpoint epistemology）。这不是一种相对主义观点；它比相对主义更具抱负。立场认识论强调研究者或认知者“情境性”（situatedness）的作用——包括他们的身体性质、所处位置以及在世界中的地位。其核心思想是，尽管传统认识论将“情境性”视为研究者的潜在问题（即可能导致偏见），但实际上，它可以是一种优势。立场理论认为，有些事实只有从一种特殊的视角才能被看到，这种视角就是那些被社会压迫或“边缘化”的人群的视角。那些处于边缘或底层（bottom of the heap）的人，将能够以他人无法做到的方式批判基础——无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在政治讨论中。科学将从更认真地对待具有这种特殊视角的人所提出的思想中获益。这并非相对主义立场，因为被边缘化的人被认为确实比其他人更能更好地获取关键事实。

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主要辩论之一，发生于哲学女性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与更激进的观点（特别是立场认识论）之间。立场理论认为，边缘化人群的经验具有特殊价值。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这种价值是什么样的呢？正如朗吉诺（Longino）所论证的，这不太可能是一种普遍的优越性，不足以证明我们将边缘化观点视为最重要或最可靠的理由。如果某些事实对边缘化和受压迫者来说更容易看到，那么其他事实肯定对享有特权的人来说更容易看到。边缘化人群的经验更有可能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输入，在讨论和论证中发挥价值。因此，正确的思考方式是将其视为一个由不同观点的人所贡献的“思想库”（“pool” of different ideas）。朗吉诺认为，由此形成的图景是经验主义的一个修订版本。

海伦·朗吉诺（Helen Longino）提出的“语境经验主义”（contextual empiricism）。这是一种强调社会互动作用的经验主义形式。朗吉诺认为，为了能够区分理性和非理性，我们应该将社会群体作为我们的基本单位。科学之所以是理性的，在于它从反映不同观点的多元选项库（diverse pool of options）中选择理论，并通过无胁迫地达成共识的批判性对话来做出选择。思想库中思想的多样性，通过参与讨论者背景的多样性来促进。认识论因此成为一个旨在区分良好和不良社群层面程序的领域。

如果这是将女性主义思想融入认识论的正确方式，那么它遵循的是一个相当古老的传统（正如朗吉诺也不会否认的）。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看到的，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曾论证了在科学社群中保持多样性的重要性。而且，正如伊丽莎白·劳埃德（Elisabeth Lloyd）所论证的，费耶阿本德是在扩展和激进化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证思路（参见劳埃德 1997年的著作）。对密尔而言，多样性通过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为社会和知识进步提供了原始材料。

观点多样性能够改善批判性讨论的观点，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性别在这种多样性中的作用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正如朗吉诺（Longino）等学者所接受的那样。那么，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男性和女性是否真的存在与科学相关的不同视角呢？女性主义者承认，其他差异，特别是阶级差异和族裔差异，可能与性别差异产生同样大甚至更大的影响。但是，许多女性主义者仍然预期，在巨大的思想多样性（“智力多样性这碗大杂烩”）中，会存在某种因性别差异而导致的明确“模式”（“patterning”）。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预期女性会拥有一种不同于男性、且源自其不同经验的理论化或推理风格呢？毫无疑问，在某些事实上，女性确实倾向于持有不同的视角。作为女性或男性的生理经验，将对某些生活方面的体验产生影响。至少在不远的将来，女孩和男孩的早期教育和文化熏陶也将产生这种影响。但是，我们应该警惕那些远超于此的主张。女性的经验和观点是否会以一种对科学争议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系统性方式与男性不同，这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在这里，存在陷入简单化概括的风险。

这个问题将我们带回到前一部分讨论的一些议题。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论证某个科学领域中发现的特定偏见或对选项的忽视可能源于性别。灵长类动物学就是认真对待这种论点的一个领域。此外，还可以超越这一点，论证女性科学家拥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如果真是这样，这可能部分源于女性倾向于独特的思考方式，也可能部分源于她们在男性主导领域中的处境和经验。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伊芙琳·福克斯·凯勒对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McClintock）的研究。麦克林托克是发现生物体基因组内可移动的“跳跃基因”的遗传学家。“跳跃基因” 的观点曾一度被认为是非常奇怪的假设，但麦克林托克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麦克林托克在遗传学界非常像一个局外人，凯勒还认为她有一种 “对有机体的感觉” ，这使她能够采取与男性同事不同的科学风格（1983年）。这种 “感觉” 可能指的是一种更整体、更直觉、更注重有机体自身复杂性的认知方式。凯勒在这里的论断相当谨慎；她不希望主张女性和男性在科学工作中存在 “明显区分” （2002, 134页）。但她似乎确实认为会存在一些系统性差异。然而，许多人可能会反对将 “对有机体的感觉” 作为例子。可以论证，这种心理特质存在于许多优秀的生物学家身上，并且与性别无关。女性主义者本身（包括凯勒）也非常警惕可能助长对女性在科学思维贡献方面的刻板印象。作者举例说明了这种刻板印象： “吉姆，我们团队必须有一个女性，这样才能有人注意到这些反应中可能存在的整体性、相互关联的东西！”

在这里，我讨论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理论风格”上可能存在的差异。另一种可能性是，女性倾向于为科学社群带来不同类型的社会互动。女性主义者有时曾提出，女性总体上比男性更不具竞争性、更具合作性。然而，作者也立即补充道，许多女性主义者现在会希望避免这种简单的概括（并引用了Miner和Longino 1987年的研究）。如果存在任何这种性质的差异，它们可能会对科学产生重要影响。下一章将详细讨论科学内部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届时将再次回到性别差异的问题。

* 1. **科学研究、科学大战与索卡尔骗局**

本章和前一章的一个主要主题是，旨在普遍理解科学的领域范围持续不断地扩大。我详细讨论的两个例子是科学社会学（第八章）和女性主义批判（本章）。除了这种范围的扩大，还出现了学科边界的模糊化。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研究人员决定顺应这一趋势，并创建一种研究科学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将借鉴许多不同领域的知识，而无需担忧“谁的问题属于谁”。

由此形成的领域通常被称为“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这个混合体现在不仅包括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还涵盖了文化人类学、古典学、经济学、部分文学理论、女性主义理论，以及符号学、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等更为边缘的领域。其目标是借鉴几乎所有能够促进我们理解科学如何发展、如何运作以及它扮演何种角色的领域。最近，技术研究，作为一个与科学不同的领域，有时也被明确地添加为研究目标。

这种（学科）重组的结果既没有实现（一些人可能希望的）“巨大突破”，也没有成为一场“灾难”（作者将在下文解释为什么可能被视为灾难）。关于科学的近期思考历史确实表明，在这个领域存在着跨学科交流（cross-fertilization）、借鉴（borrowing）和合作（joint work）的良好机会。但学科之间的界限不太可能真正消失；因为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看待世界的方式确实有所不同。因此，我们自然会在“科学研究”领域内部发现混合多样的研究风格，范围从最严谨、复杂的历史研究到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后者甚至让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一位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其非传统和具争议性的理论著称）看起来像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一位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以其严谨的逻辑分析和经验主义方法闻名）。然而，作者并不否认该领域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某些独特的倾向和侧重点；其中之一将在本章末尾进行讨论。

“科学研究” 中一些最具争议的工作，与人文学科中臭名昭著（notorious）的 “后现代主义” 运动相关联（引用了哈维1989年和利奥塔1984年的著作）。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思想和项目的家族，涵盖了从建筑到艺术、历史和语言哲学等领域。与我们在此相关的主题是表征（representation）和意义（meaning）。后现代主义是人文学科中近期的一个传统，它反对将语言分析为一个用于表征（represent）或 “代表” （stand for）世界中对象和情境的系统。这种反表征主义的语言观在20世纪后期影响了许多文学理论以及其他人文学科。后现代主义是这一思想路线的惊人“产物” 或 “结果” （spectacular outgrowth）。

有时后现代主义者似乎在争辩，我们当下正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的表征作用正被一种新作用所取代的时代。我们所处的符号和语言的海洋，以及它们在政治和消费文化中的作用，已经“V破坏了符号”与客体之间普通的表征关系。在理解符号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时，再运用准确性（accuracy）、指称（reference）和真理（truth）等概念已经不再有用：因为“在每个符号背后，都不是一个真实的客体，而是另一个符号。在其他时候，后现代主义似乎变成一种极其晦涩(tremendously obscure)的方式，用以论证极端形式的相对主义，有时甚至导致一种怀疑论和无为主义（do-nothingism，指什么也不做或放弃行动的倾向），并提出关于语言与实在如何关联的奢华（extravagant）形而上学观点。

“科学研究” 领域对后现代主义以及其他人文学科中 “大胆的” （adventurous）思想持相当欢迎的态度。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严谨的（sober）、一丝不苟的（rigorous）科学史学家们停止了他们的工作；作者强调， “科学研究” 是一个多元化的实体。然而，这种研究科学的新方法与人文学科中晦涩难懂（obscure）的思潮之间的关系，影响了 “科学研究” 领域所形成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反作用（backlash）出现了。

这种反击表现为对“科学研究”以及更广义上人文学科近期工作的攻击。部分反击源于科学界内部；科学家们对呈现给更广大文化（即社会大众）的科学图景感到震惊和担忧。但大部分的热议和喧嚣（heat and noise）是由于评论员们批判学术界和教育界内部的更大趋势。普遍的看法是，科学本身正受到威胁。

由此引发的冲突被称为“科学大战”（Science Wars）。“科学研究” 以及本章涉及的其他工作，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战场。对这些研究工作的某些攻击，来自政治和社会思想中的保守主义阵营。 “传统” 教育的倡导者，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里的，都担心西方文明的宝贵遗产和价值观正受到大学里激进左翼教员和学校里思想软弱（soft-minded）的管理者的侵蚀。这些保守主义者认为，人文学科已经 “堕落” （gone to hell），现在它们还试图通过无休止的、宣称科学 “只是另一种知识获取方式，没有特殊地位” 的相对主义论调（relativist bleating，带有贬义，指喋喋不休的抱怨或主张）来破坏科学。

尽管其中一些论战具有简单的政治结构，但最具影响力和最有趣的事件并非如此。1994年，美国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向一份名为《社会文本》（*Social Text*）的文学-政治期刊提交了一篇论文，该期刊当时正在筹备一个关于科学的特刊。这篇论文是对 “科学研究” 领域激进作品的戏仿（parody）；它使用后现代主义的行话来讨论近代数学物理学中蕴含的进步政治可能性。这篇论文的标题就能让人感受到其风格： “跨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转化诠释学” （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这篇论文的论点完全荒谬，而且常常非常滑稽。索卡尔的目的是看看这篇论文是否会被该期刊接受并发表；他认为，如果发表，这将表明该领域已经丧失了所有的知识标准，并且会发表任何使用了正确流行语并表达了适当政治情感的文章。

《社会文本》（*Social Text*）发表了这篇论文（索卡尔 1996b），而索卡尔随后在《大语种》（*Lingua Franca*）期刊（1996a）上揭露了他的骗局。这份期刊是一份对学术生活不敬的（irreverent）刊物（遗憾的是，至少目前已停刊）。由此引发的轩然大波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也登上了报纸头条。索卡尔的攻击之所以如此有效，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并非从保守政治的立场出发。他将自己塑造成一名左翼人士，认为左翼已经迷失了方向。潮流的法国哲学和文学理论的“海妖之歌”（siren song，指诱惑人的事物），使左翼以及更广义的“进步”政治，偏离了其早期与科学的联盟，并使其陷入一个无用且故作姿态的泥潭（pretentious quagmire）。

索卡尔骗局发生后，英语世界的许多哲学家感到自己的立场得到了证实（vindicated）。尽管英语世界的哲学也曾产生过关于科学的激进思想，但它大多并未接受后现代主义以及其他受法国影响的文学-哲学运动。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这位或许是同期所有人文学科中最著名的人物，从未被主流哲学界（philosophical establishment）所接受，并且被许多人视为几乎是江湖骗子（virtual charlatan）。哲学家们认为，由于他们对清晰论证（clear argumentation）的哲学要求，他们自己的期刊是“骗局免疫的”（hoax-proof）。（作者不知道这种信念是否经过了检验。）

索卡尔骗局发生后，一些主流的科学哲学家感到非常振奋（elated）。他们此前数十年在面对相邻领域那些更“刺激”的研究时，常被衬托得显得枯燥无趣（dried-up and boring）。在1996年科学哲学协会的会议上，物理学哲学资深学者阿布纳·西蒙尼（Abner Shimony）发表了主席演说。西蒙尼的演讲重申了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即科学、民主、理性、平等和世俗主义的价值观。西蒙尼称赞索卡尔是“启蒙运动的英雄”，因为他揭露了激进“科学研究”的愚蠢之处。

尽管一些哲学家感到自己的立场得到了证实，但另一些人则认为损害已经造成。在西蒙尼演讲后的讨论环节中，阿瑟·芬恩（Arthur Fine）和菲利普·基彻（Philip Kitcher）这两位同样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感到惋惜。他们认为，在花费多年时间弥合学科间鸿沟并建立对话之后，索卡尔的行动很可能再次使一切两极分化（polarize everything again）。这种担忧是相当合理的，因为一些学科之间长期存在不信任感。哲学家们可能会认为，邻近领域已经丧失了所有知识标准，从而不再关注这些领域的研究。另一方面，社会学家则可能认为，哲学的潜在保守主义再次暴露无遗；毕竟，他们会说，那些自鸣得意的（smug）哲学家们站在了索卡尔“廉价一击”（cheap shot）的一边。“Cheap shot” 在这里指不公正、不费力但具有破坏性的攻击。

索卡尔骗局并未对“科学研究”领域造成严重损害，但确实带来了一些持久的影响。正如我之前强调的，这个领域一直都是多元化的，尽管在外界看来，它的形象有时被那些最具风险的研究工作所主导。现在，人们对那些充斥着行话且晦涩难懂的写作容忍度降低了。这是一件好事，也足以让我们对索卡尔所做的事情感到庆幸。关于“科学研究”应该如何进行的内部过度纠结，虽然确实存在，但在索卡尔事件之前就已经如此了。更重要的是，不同领域之间鸿沟会急剧扩大的担忧并未成为现实。这表明，尽管有过激烈的“科学大战”，但学术交流和跨学科合作的根基并未被彻底动摇。

再次强调了“科学研究”领域内部的混合性，即既包含“直接的”、传统严谨的历史研究，也包含“曲解的”（bent）、带有强烈主观解释色彩的对科学与文化的文学分析。但是，这个领域确实展现出一些普遍倾向。其中一个在这里尤为相关：“科学研究” 对通过科学理论与世界结构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科学变化模式的观点持相当敌视的态度。库恩（Kuhn）和第八章讨论的社会学研究在这里留下了持久的印记。 “科学研究” 最坚决反对的解释是，根据理论的真实准确性或解释力来解释其流行度。根据我们目前对某个理论价值的估计来解释其历史作用，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更普遍地说， “科学研究” 怀疑整个从科学理论如何与世界自身预先存在的结构相关联的角度来审视科学理论的观念。这种立场导致了 “科学研究” 所提供的科学描述中存在一个空白（gap）。在描述了科学自身的社会结构之后，我们还需要理解这种社会结构及其产物如何与科学活动所嵌入的更大自然世界相连接。这将是后续章节的主题之一。

（此段为忠实翻译，没有添加任何个人理解和注释，因为我认为一般只有在简明扼要的说明某个理论的错误，精髓，不足时才会添加一些明确的简短的定于。比如：经典力学。而为某个科学理论添加性别定语过于“不伦不类”。社会学层面的上的议题，个人认为“公平”，公平的机会为主要原则，那么“加了性别限定的公平”还公平吗？所谓的“女性主义”实在乏味。至于关于后现代主义，作为“未来人”，后现代主义的热潮过后，出了艺术领域的一些“作品”，在科学和哲学方面并不是能让我对其产生兴趣。）

………………………………………………………………………………………………

拓展阅读

凯勒和朗吉诺的《女性主义与科学》（1996年），以及珍妮特·库拉尼的《科学的性别》（2002年），都是非常有用的文集。后者相当全面，包含了我在第9.3节中使用的赫尔迪的论文。赫尔迪的书《从未进化的女性》（1999年）对她的观点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唐娜·哈拉维的《亲密的愿景》（1989年）则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灵长类动物学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历史和社会学讨论。另一个有趣的女性主义案例研究是伊丽莎白·劳埃德关于女性高潮进化理论的研究（1993年）。

哈丁的《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1986年）和隆吉诺的《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1990年）是应用于科学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两本书。1994年，《一元论》杂志曾特别刊登过关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专题。

马里奥·比亚焦利的《科学研究者读本》（1999）是一个很好的合集，展示了该领域工作的多样性。关于科学战争，可以参考格罗斯和莱维特的《更高的迷信》（1994），其中包括对布洛尔、拉图尔、香彭、沙弗、哈丁、朗吉诺，以及我在这些章节中讨论的其他各种人的批评。还可以参考科特尔的《沙上建屋》（1998）。索卡尔恶作剧是一本由《语言法兰克》编辑（2000）编辑的书的主题（同名）。关于索卡尔恶作剧，网络上也有大量材料；特别参见索卡尔的网站：http://physics.nyu.edu/faculty/sokal/.